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城乡收入差距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秦晓娟^{1,2}, 孔祥利¹

(1.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 山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 基于 1 415 份调查问卷数据, 采用 WLS 方法, 分别从全国、东中西 3 个区域层面, 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城镇化率、转移劳动力家庭年收入及农村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等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 在全国、区域层面, 选择性变量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有正有负, 而农村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变量的扩大均会使城乡差距缩小; 东中西区域对比分析得出西部劳动力向省外转移较东中部会使城乡差距缩小。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继续引导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多元转移; 积极培育新型主体; 通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双向互动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转移的选择性; 城乡收入差距;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 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5)02-0073-06

DOI 编码 10. 13300/j. cnki. hnwkxb. 2015. 02. 010

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很多研究。如: Irfan 研究了巴基斯坦劳动力的流动, 得出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力输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几乎很小^[1]; 费景汉等在刘易斯的基础上, 讨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 强调了工业与农业两部门平衡发展的重要性^[2]; Ghosh 总结了“平衡增长理论”的传统假定, 提出劳动力流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并缩小地区差距^[3]; Cashin 等以印度为例对 Ghosh 的假说进行了回归验证, 发现劳动力流动事实上并不能消除地区差距^[4]。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增长极理论、累积因果循环理论均认为经济中存在一种“正反馈机制”作用, 提出劳动力转移很可能加速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和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时扩大的现象, 针对这一现象, 国内众多学者就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 缩小作用。劳动力

转移可增加农民收入^[5-6], 强调如果将被调查体系遗漏的农村长期外出劳动力及其家庭收入纳入考察范围, 则劳动力流动在理论和事实上都会缩小城乡差距^[7], 转移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 1%, 城乡收入差距将下降 0.005 9^[8]。第二, 扩大作用。劳动力转移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9]。第三, 双向作用。劳动力转移通过“要素收入均等化效应”缩小城乡差距, 也通过其他途径扩大城乡差距^[10-12], 二者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 前者在短期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在长期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 Granger 原因^[13]。第四, 无影响。受户籍制度约束, 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14], 劳动力流动率对城乡差距无显著影响^[15]。

现有成果较多地研究转移规模对城乡差距的作用, 未考察劳动力转移的结构因素, 即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结构、转移目的地等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且未将东中西部 3 个区域进行对比分析, 也未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对城乡差距的

收稿日期: 2014-07-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消费差异的农民市民化效应研究”(11BSH013); 山西省社科联重点项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与山西现代农业驱动研究”(SSKLZDKT2013072); 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西农村人口转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机制研究”(20132-29)。

作者简介: 秦晓娟(1982-), 女,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发展经济学。E-mail: nanmi108@163.com

作用纳入思考,因为新型主体对农村而言是农业经营力量的注入者,城乡差距受转出者与转入者的双重影响。笔者拟通过 1 415 份调查问卷数据,采用 WLS 方法(加权最小二乘法),重点分析 3 个问题:一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结构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二是选择性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在东中西部有无差异;三是新型主体对城乡差距的影响。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

转移的选择性指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具有选择性,即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转移目的地等被城市选择或者是劳动力自身主动选择。据中国《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2 年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已达 2.62 亿。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会呈现什么特征呢?本文采用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农民市民化效应研究”的有效调查问卷中的相关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西部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甘肃、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等)区域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文中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该课题组的调查问卷(该课题调查组于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对我国东西中部 28 省市的农村地区进行入户调研,共发放问卷 1 860 份,收回 1 503 份,符合研究目的的有效问卷为 1 415 份,有效率为 94.15%)。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情况如下:

第一,年龄。全国层面的样本年龄最大 70 岁,最小 16 岁,平均 32.60 岁。21~25 岁占比最大,41~45 岁占比次之,56 岁及以上占比最小。区域层面,东部最大 66 岁,最小 16 岁,平均 31.70 岁;中部最大 65 岁,最小 16 岁,平均 32.50 岁;西部最大 70 岁,最小 16 岁,平均 33.19 岁。三大区域转移者 21~25 岁年龄段均占比最大。东中西部样本平均年龄依次增大,但是都小于 34 岁。说明外出劳动力呈年轻化态势。

第二,性别。调查显示,劳动力中男性占 61.7%,女性占 38.3%。东、中、西部男性比例分别为 60.5%、62.9% 和 61.8%,女性比例分别为 39.5%、37.1% 和 38.2%。无论是全国还是区域,男性比例都大于女性。反映出外出劳动力呈男性化态势。

第三,受教育程度。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中专、技校等)、大专及以上学历 4 个受教育等级换算为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6、9、12 和 16 年。通过计算,样本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依次占比为 13.9%、45.6%、28.1% 和 12.4%,平均为 10.29 年。东中西部分别为 10.70 年、9.90 年和 10.20 年。三大区域中初中占比最大,高中次之。东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西中部,中部小学学历的占比超过西东部。

第四,转移目的地。东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目的地分布情况见表 1。东西部转移劳动力多选择在本区域内就业,分别占 89.2% 和 82.4%,很少选择到中部;而中部则有 76.1% 转移到东、西部就业,仅有 23.9% 在本区域就业。

表 1 中西部转移者目的地分布情况

转移目的地	东部(转出地)		中部(转出地)		西部(转出地)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东部	外省	35	9.2	116	33.8	103	15.4
	本省	303	80.0				
中部	外省	11	2.9	12	3.5	15	2.2
	本省			70	20.4		
西部	外省	30	7.9	145	42.3	82	12.3
	本省					469	70.1
缺失值	—	5		7		12	

综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选择性,即高素质化、年轻化、男性化,且东西部的劳动力绝大多

数在本区域就业,而中部的劳动力则多去东西部就业。

二、选择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1. 变量说明及赋值

因变量、自变量的说明及赋值见表2。

(1)转移劳动力的年龄 X_3 、性别 X_4 、受教育程度 X_5 、转移目的地 X_7 等变量采用课题组的微观数据,而城乡差距 Y 、城镇化率 X_1 、人均耕地经营面积 X_6 等数据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年的汇总统计数据整理而得,城乡差距、城镇化率变量取汇总数据

是因为受限于个体数据可获得性;人均耕地经营面积变量取汇总平均数据是因为课题组的数据资料未将其包括在内。计量模型将汇总数据作为个体数据的平均值来对待,不违背相关统计原理。

(2)变量 Y 、 X_1 及 X_6 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地区2012年度数据整理而得。

(3) X_6 表示农民经营规模(该指标虽不能直接代表新型主体的经营规模,但是当农村经营的规模增加时,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规模经营行为本质)。

表2 变量说明及赋值

变量	说明及赋值
城乡收入差距 Y	被调查者转出地省份(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城镇化率 X_1	转移者家乡所属省市的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家庭收入水平 X_2	人民币/元
年龄 X_3	由于样本最小年龄为16岁,所以此处的年龄是其真实年龄减16/岁
性别 X_4	男性=1;女性=0
受教育程度 X_5	受教育的年限/年
人均经营耕地面积 X_6	被调查者家乡的农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667 m ²
转移目的地 X_7	省外转移=1;省内转移=0

2. 模型构建

构建模型 I:

$$\ln(Y) = \varphi_0 + \varphi_1 \ln X_1 + \varphi_2 \ln X_2 + \varphi_3 X_3 + \varphi_4 X_3^2 + \varphi_5 X_4 + \varphi_6 X_5 + \varphi_7 \ln X_6 + \varphi_8 X_7 + u$$

φ_i 是待估系数 ($i=1, 2, \dots, 8$), u 是随机扰动项。

选 $\omega = 1/\sqrt{u^2}$ 为权重序列修正异方差,采用 EViews 7.2 软件进行 WLS 估计,结果见表3,多重共线性程度小,可予以忽略,且系数符号均符合经济学意义。

3. 计量结果分析与讨论

(1)城镇化率、转移者家庭年收入、农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劳动力向外省转移等4个变量与因变量呈显著负向关系。下面重点分析后两个变量的作用。

首先,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扩大有利于城乡差距缩小。第一,现有农村人均经营耕地的面积其实是从家庭承包责任经营制度实施以来,传统农户经营的规模。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的重要阶段,传统农户及其经营规模显然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所以需要培育新型主体,该主体经营规模扩大是必要条件之一。第二,新型主体的出现并发挥作用能够很好地改善由于转移者的选择性而使农业发展处于不利的局面,进而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劳动力的转移。第三,现有土地制度下,农地的流转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障碍,所以有可能出现事实上土地已流

转至规模经营的主体手中,但是统计登记的经营面积仍是原有面积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现阶段会大量存在,但不影响理论分析。

其次,劳动力向省外转移会缩小城乡差距。第一,转移者的收入增长较多^[16],将收入转移回农村家中的比例较多;第二,可能省外就业收入高于省内就业;第三,东西部劳动力向本省内转移分别占80.0%和70.1%,所以转移目的地对于城乡差距呈正向作用。中部劳动力向本省转移只占到20.4%,所以转移目的地对于城乡差距呈负向作用。

(2)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变量与因变量呈显著正向关系。年龄呈倒“U”型作用,转折点为48.9岁,样本平均32.6岁,所以现阶段会继续拉大城乡差距;性别及受教育变量的影响效果分别为0.8%和0.2%。因为:第一,年轻化、男性化、受教育程度提高一方面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使得农业劳动力素质相对弱化或绝对弱化^[17],而导致收入水平相对或绝对下降,从而拉大城乡差距;第二,选择性虽会给城市带来“城市病”,但因其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劳动力成本下降,从而利润上升,结果使城市居民收入升高,进而拉大城乡差距;第三,从表面看,虽然转移者将其部分收入放回农村,但是其劳动力的纯粹收入汇款数量通常是比较低的^[18],这部分收入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而言很难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其在预期自身真实收入水平时也大多不将这部分包括进去;第四,47.9%的转移者处于21~35岁之间,该年

龄段存在结婚及婚后家庭的支出需求,所以收入与支出之间极可能处于平衡状态,对农村家庭而言形不成固定收入;第五,返乡劳动力大多具有年老体弱、就业失败的特征,且所带回的个人技能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

三、选择性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1. 三大区域分别考察

与全国实证分析同理,分别对东中西部构建模型Ⅱ、Ⅲ、Ⅳ,并进行WLS估计,考察转出者的选择

性变量及转出地的新型主体变量对转出地所在省份(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见表3。

依据回归结果,可知各变量在三大区域的作用存在异同:

(1)差异之处。农村家庭收入变量在中部呈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东西部则显著相反。该变量理论上应该发挥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造成中部的计量结果与经验认知存在偏差可能是家庭总量收入增加不必然使样本人均纯收入提升所致。受教育程度变量在东部呈负向作用,在中西部则显著相反。说明东部转出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会越缩小转出地省份城

表3 WLS估计结果(因变量lnY)

自变量	I	II	III	IV	V	VI
lnX ₁	-0.629 7***	-0.134 0***	-0.131 1***	-0.241 1***	-0.178 0***	
lnX ₂	-0.038 1***	-0.004 3***	0.012 9***	-0.015 3***	-0.010 7***	
X ₃	0.001 7***	0.000 2***	-0.001 3***	0.000 4***	1.35E-05	
X ₃ ²	-2.55E-05***	-5.27E-06***	3.91E-05***	-1.95E-05***	-4.16E-06***	
X ₄	0.008 4***	0.001 3**	-4.24E-05	0.002 1***	0.002 2***	同V
X ₅	0.002 2***	-0.000 3**	0.002 1***	0.000 4***	0.000 2**	
lnX ₆	-0.083 6***	-0.086 3***	-0.101 4***	-0.110 5***	-0.097 1***	
X ₇	-0.033 4***	-0.002 2	0.003 5***	-0.013 8***	-0.008 4***	
C	3.965 6***	1.615 6***	1.408 8***	2.403 9***	1.853 5***	
M					-0.013 4***	-
W	-	-	-	-	0.252 8***	0.266 2***
E					-	0.013 4***
有效观测次数	132 6	354	331	646	133 1	133 1
R ²	0.999 9	1.000 0	0.999 9	0.999 9	0.999 9	0.999 9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乡差距,但是影响系数仅为0.000 3;中西部转出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会越拉大转出地省份城乡差距。年龄变量在东西部呈倒“U”型作用,转折点分别在32.2岁和25.7岁,在中部则呈“U”型作用,转折点在32.5岁,但是影响力均很小。三大区域样本平均年龄分别为31.7岁、32.5岁和33.2岁,所以该变量在东部会继续拉大城乡差距,在中部停留在扩大城乡差距的最低点附近,在西部则会缩小城乡差距。性别变量在东西部呈显著正向作用,在中部则作用不显著;转移变量在东西部呈负向作用,但在东部不显著,在中部则呈显著正向作用。这与样本中东部有89.2%、西部有82.4%的转出者选择在本区域就业,而中部仅有23.9%的转出者选择在本区域就业有关。因为转移至本区域较其他区域可能更易使转移者较快适应就业环境,从而较易形成稳定工作及收入,进而有利于缩小本区域城乡差距。总之,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对转出地省份城乡差距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

(2)相同之处,城镇化率提高及人均经营土地面积的扩大会显著缩小城乡差距。

2. 三大区域对比分析

(1)构建模型。以东部为基组,引入变量:M=1是转出地为中部,M=0是转出地为非中部;W=1是转出地为西部,W=0是转出地为非西部,将其嵌入模型I。以中部为基组与此同理,WLS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的V与VI列。进一步引入虚拟变量的交互项M×X₇、W×X₇及E×X₇(模型Ⅶ、Ⅷ、Ⅸ)来考察转移者向省外转移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结果见表4。

表4 WLS估计结果(因变量lnY)

	Ⅶ	Ⅷ	Ⅸ
M×X ₇	0.002 5	-	0.016 6***
W×X ₇	-0.014 1***	-0.016 6***	-
E×X ₇	-	-0.002 5	0.014 1***
X ₇	-0.000 4	0.002 1***	-0.014 5***
有效观测次数	133 1	133 1	133 1
R ²	0.999 9	0.999 9	0.999 9

注:由于多数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同模型V符号一致,且数值相差不大,故只列出变化较大的自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2)计量结果分析。城镇化程度、收入水平、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转移目的地等

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与全国一致,只是影响效果有所变化。年龄变量的影响很小。以东部为基组,西部转移者外出就业会使其转出地省份城乡差距较东部转移者外出就业使东部转出地省份城乡差距显著扩大25.3%,而中部较东部会使城乡差距显著缩小1.4%,以中部为基组,西部较中部会使城乡差距显著扩大26.6%。

另外,鉴于对现实复杂情况的反映程度,分析时应考虑交互项的影响。引入交互项之后,中部较东部劳动力向省外转移导致城乡差距扩大0.25%,但不显著。西部较东、中部会使差距分别缩小1.4%和1.7%,说明东中部劳动力向外省转移使城乡差距拉大的程度较西部深。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依据1415份农村转移劳动力调查相关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分析转移选择性、新型主体等变量对转出地省份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从全国角度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城乡差距呈正向作用,转移目的地变量在东西部呈正向作用,在中部则呈反向作用,但新型主体的经营会使城乡差距缩小;从区域层面考察,选择性的作用有正有负,但新型主体则会使城乡差距缩小;将三大区域对比分析,劳动力向外省转移在东中部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而在西部则使城乡差距缩小。

选择性使城乡差距扩大是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该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制止转移或者强制消除选择性来解决,而应将考虑重点放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因素上。通过对全国分析的模型取标准化系数,可知城镇化、农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转移者家庭年收入3个变量对城乡差距缩小的作用递减。鉴于城镇化在全国各地都处于积极推行中,加之转移影响农业经营主体,所以应着重考虑新型主体对城乡差距缩小的积极作用。随着转移规模的扩大,进而农民市民化人数的增加,势必使得农业经营人数减少,从而使农村人均经营土地面积提高,该数值的提高为新型主体的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规模经营要素,而且新型主体数量的增加或规模的扩大会提高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率,从而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农村人均土地经营面积进一步扩大,进一步为新型主体提供更大规模经营的土地要素,依此不断进行,直至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及其逆

转移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在该状态下,农民在新型主体的农业企业中上班与在城市上班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没有薪酬的差别。

2. 政策建议

(1)继续引导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多元转移。鼓励转移的同时,对其家庭留守人员的生产和生活妥当照顾、安置。对城市而言,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积极探索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制度安排;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制度;逐步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提高城市与转移者的融合度^[19],重点是使城乡居民享受同等公民权利、居住权利等。

(2)积极培育新型主体。第一,在科学认识新型主体的本质(即以进行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各地现实情况培育支持适合的新型主体类型。第二,完善培育新型主体的机制建设。新型主体的培育需要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由政府积极供给适合产生和支持新型主体的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完善和科学落实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要实现规模经营,必须有完善的土地流转等管理制度作保障。二是健全农村金融和保险制度。现代生产要素要求投入资金规模大,而且农业经营面临较大的自然、市场等风险,所以农村金融和保险制度亟须完善。三是提升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财政支持效率。四是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在新型农业企业就业的培训力度,积极吸引转移者返乡创办新型农业企业或在新型农业企业就业。

(3)通过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双向互动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新型农业企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与践行者,随着农业经营的现代化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二者双向互动促进作用会进一步使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的缩小反过来也有利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20]。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第一,针对不同地区现有城镇化模式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进行科学评估,尤其突出对县域城镇化的科学评估。如现有城镇化模式对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不显著,需要明确是模式本身不够完善还是模式发挥作用的时间不够,抑或是其他方面原因,进而寻找能够高效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城镇化模式。第二,积极引导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农村流向给予倾向性的政

策支持和政策奖励。第三,进一步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政府不是公共品的唯一高效供给者,政府和市场作用应有机结合,加快城乡公共品供给一体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IRFAN M.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some selected issues[J].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1986, 25(4): 743-753.
- [2] [美]费景汉,拉尼斯. 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 王月,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3] GHOSH B. Migration-development linkages: some specific issues and practical policy measure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92, 30(4): 423-452.
- [4] CASHIN P, SAHAY R. Internal migration, center-state gra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tates of India[J]. Also Published in Staff Papers, 1996, 43(1): 134-142.
- [5] 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 16-33.
- [6] 许秀川,王钊. 重庆市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系统动力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8(1): 91-97.
- [7] 蔡昉,王美艳.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学动态, 2009(8): 4-10.
- [8] 张杰飞.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差距实证研究[J]. 广东农业科学, 2013(4): 221-224.
- [9] 郝爱民.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结构变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J]. 生产力研究, 2006(12): 39-40, 56.
- [10] 蔡昉,万广华. 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33-149.
- [11] 傅鸿源,陈煜红,叶贵.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探析[J]. 经济经纬, 2008(5): 104-107.
- [12] 朱长存,马敬之. 农村人力资本的广义外溢性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4): 37-47.
- [13] 杨宗锦,卢明芳.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95-97.
- [14] 蔡昉.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 经济学动态, 2005(1): 35-39, 112.
- [15] 王小鲁,樊纲.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10): 24-36.
- [16] 孔祥利,毛毅.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 重庆社会科学, 2009(9): 28-34.
- [17] 郭剑雄. 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0(5): 5-16.
- [18] MICHEAL L.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of poor countries: the impact on rural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J]. World Development, 1980, 8(1): 1-24.
- [19] 粟娟,孔祥利. 中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分析——基于全国 28 省 1249 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2, 27(12): 96-101.
- [20] 杨志海,刘雪芬,王雅鹏.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 1523 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2-48.

Transfer Selectivity of Rural Labor,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Entities

QIN Xiao-juan^{1,2}, KONG Xiang-li¹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030801)

Abstract Based on 1415 survey data and the method of WLS regress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mpacts of transfer selectivity, rate of urbanization, yearly income of family featured by labor transfer, and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acreage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from national level and regional level respectively. And it found that different selectivity variable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o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but the per capita agricultural acreage variable ha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gional level, it found that the gap would be shorten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labors in western areas were transferred to other provinces in middle and eastern areas. Accordingly, it proposed to continue to guide and encourage the rural labors' transfer, to cultivate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entities actively,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labor; transfer selectivity; urban-rural income gap;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entity;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刘少雷)